

[白寿彝思想研究]

金茂岳先生访谈录

金茂岳口述,朱桂同根据录音整理

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计划同时访问一些回族老同志,以保存革命史料。当时即委托朱桂同女士多次访问了金茂岳同志。现在应本刊约请,朱桂同女士根据当时的访问录音带整理成这篇革命回忆录,它展示了一个回族知识分子追求革命的历程。白寿彝、金茂岳二位老人均已故去,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是对二位老人的悼念。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2-0029-10

童年、家世与学医

我的老家在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市城东圣庄公社岗上大队。我祖父讲,我们家不是此庄人,原是山东济南历城县小金庄人。曾祖父一无土地,二无房子,是个乞丐。街坊、阿洪们看他人不错,也很聪明,就叫他到清真寺里念经。后来挂了幛^①,就在清真寺里当了阿洪。祖父只有我父亲一个独生儿子。父亲结婚后,母亲生了5个女孩。旧社会重男轻女,没有男孩子不行,本村另一家姓金的送给我父亲一个男孩,叫来兴,他就是我的大哥。后来,母亲生了个男孩,没活成死了。之后母亲又连续生了3个男孩,又怕活不成,就都认了对门一家姓马的人家为干娘、干爸。姓马的这一家孩子多,个个长得都很好,他家人口兴旺,让他们也带着我家的几个男孩子长起来。所以,我二哥叫马带,我叫马生,四弟叫马长。这是马家“带生长”嘛。我的小名叫马生,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兄弟四人的大名都带“山”字,叫金茂崑、金茂岱、金茂峯。

我的父亲读过私塾。他喜欢看药书,学点医道,给亲戚朋友们看病、开药,逐渐就成了医生,他还请了

一个姓朱的老师和他一块在家开业。由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搬到了城里南关开铺子。开了段时间,买药和亲戚们连吃带用,花钱太多,铺子赔光了。父亲就干脆关门回家,不干了。但是群众还希望我父亲进城开业,他又第二次出来,在西门外白衣堂街外祖父家的房子里开了一家叫做“仁和堂”的药铺。

我小时候在家乡一个阿洪办的清真小学里念过一点阿拉伯文的字母。1912年,我记得村里群众把清真寺大殿里的一个皇帝万岁牌^②拿出来,砸烂烧掉了。从那以后,我父亲就在清真寺里办个小学校,这是我们周围10个庄子里的头一个洋学堂。我在这个小学读了几年书。小学毕业后,我进城上翠营中学。在中学学习的几年,生活十分艰苦。学校离家远,开始是住校,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星期一上学要带上一周吃的煎饼,再带几个铜板买点咸菜。直到父亲进城开药铺,我才能回家吃饭了。吃饭有了地方,但交学费、买书没钱怎么办?我就勤工俭学,包了一个教室,负责打扫卫生。晚上,还管一个大教室的煤油灯、反照灯的添油和擦灯罩子的工作。一个月学校给几块钱,我就用这钱交学费和买书。1927年我从翠营中学高中毕业,学校保送我到济南上学。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简介:朱桂同(1939—),女(回族),河南开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到济南是要学医。为什么要学医呢？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一个中医大夫了。我家周围十几个村里的回族群众很多，大家有病愿看中医，吃中药。但我父亲的中医，对外伤和孕妇的难产解决不了，群众又不愿到西医医院去看病和住院。因为西医院的药都是西药，西药的用料里有酒。看外科要上药膏，药膏里边还有大油。住院就更麻烦，不是回民医院，吃饭很不方便。根据回族的习惯，对这些情况人们都接受不了，群众很希望能办个自己民族的医院，亲戚朋友们和我父亲也希望我学会外科和妇产科的一套手术，回家开业，和父亲的中医结合起来，解决回族群众看病、吃药和住院的困难。我就这样学了医。

我在齐鲁大学报名学医预科时是1927年。医预科是学2年，学完后可以再到医正科学5年。我们医预科有60名学生，学两年后考试，我因为有机化学考了59分，没及格，不能去医正科，又留了一年级。在留级的这一年，医科办了医学的调剂学班，就是学配药。我的医正科专业是学妇产科，1935年医科毕业。

1935年在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后，我感到单独工作还有困难，想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干两年，接触一下实际，还可以提高水平。正好，学校也希望我能留下，我就留在医院工作了。在齐鲁上学时，带我们的是妇产科的主任，他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五大夫或五主任。1936年他回国休假去了，妇产科由恺大夫代理，她也是英国人，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两年是恺大夫负责指导。恺大夫很好，但怕事情，胆子也小，不敢手术。她名义上是代理主任，实际上，她除了给学生讲讲课外，妇产科的一些临床和手术处理都是由我和我的同学唐玉德两个人负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俩人轮流，一个人负责一个月的妇产科的工作。当时，医院里我们的同班同学也很多，搞内科的、外科的都有，有难处我们共同商量就解决了。特别是妇产科和外科的手术都在一起，我也有机会对外科手术学习和掌握了一些，并且也操作了一些。这两年的实践很重要，也很有用处，为我后来的医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统区的抗战救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齐鲁大学人员迁移到成都。我当时在学校还搞临床教学和临床指导，学校让我和家里商量随学校迁移的事，家里嫌走得太远，所以我留在济南没有走。这期间，老齐鲁的毕业生王禹昌听说齐鲁大学还有一些大夫、护士和毕

业生在济南，他想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做些救护伤员的工作。他就从南京到了济南，进行动员和讲解。经他一说，很多同学都愿意参加救护工作，我们几个同学也报了名。大家约定在10月10号在兖州府集合，这里有一个重伤医院。

报名后，我和家里商量，父亲同意了。到兖州一看，很多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也有我们前几个班毕业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到兖州时，王禹昌已经回南京了，我们又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叫张查理的，他是南京中医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当时也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在平汉线上救护，有2000元的经费，选了一批大夫和护士组织在一起，他当队长。结果，医疗队到了包头，还没有开展工作，日本兵就打进来了，他们的人被打散，张查理背着一个德国手术包跑回南京。我们这些人都是医务人员，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医疗器械。张查理是有经费，还有医疗器械包，但是队员没有了。这时，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让我们两边合作，成立医疗队手术组，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我们这个医疗队手术组建好后，就从南京派到了安徽安庆的一个师范学院，这里是一个重伤兵医院。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医疗组织，在这里的重伤兵医院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蒋管区军医的情况。说那里的军医要技术没技术，对伤病员也不大管理。到了安庆伤兵医院，我们看到的比听到的情况更严重。医院里的纱布、红药水等敷料多得很。伤员一来，医务人员就在伤口上点红药水，用棉花、绷带一包就完事了，别的情况一律不管，很不负责任。所以，伤员伤口化脓的、发烧的、死掉的很多。伤病员的伙食也很差，思想状况更混乱。伤员都是被日本人从江北打伤下来的，多是四川人。他们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大烟枪。许多人打败仗后把步枪丢了，而大烟枪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身边，他们整天是打牌、抽烟、喝酒。对死了的伤病员，按规定是有安葬费，可是没人去管。死后的尸体用席子裹着埋掉算是好的，还有不少尸体就扔在外边无人过问。活着的伤员也多是残废，满街上都是。有的人伤不重就当土匪，去拦路抢劫。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看到国民党军医署管辖的医院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也很不顺眼。我们感到，这些青年是为了保护国家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场上受了伤，需要治

疗。我们想到了这些,就认真地为伤病员们医治伤口。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药品和器材都是很有限制的,用药十分节省。我们主要是用达金氏溶液冲洗,这种药很好,也很便宜,是自己制作的。伤兵医院的军医们说我们是糊弄人,连红药水都没有。这样一来,救护队手术组和医院的医务人员之间就有了些矛盾,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用自己制作的药冲洗,最后治疗的效果很好。很多伤病员的伤口因冲洗、消毒得及时、彻底,没有发炎和截肢的。还有不少伤病员,治愈后又返回了前线。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包围了南京,最后南京失守。悲惨的消息不断从南京传来,我们在安庆也十分不安,也在想往哪里逃才有活路。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好往后跑,也就是往西跑,往汉口跑。

到了汉口,情况更不好。从沿海来的医务人员很多,都在汉口没有工作,原来营区医疗队的卫生署也不愿管了。齐鲁大学听说我们回汉口了,打电报让我们回成都的学校去。南京中央医院这时也搬到了成都,学校也给张查理来电报,让他回成都。回成都都要坐船,买一张船票需要100块现洋,还要很费劲才能买到。张查理有钱,买了一张票走了。我当时很困难,原来带着几个孩子,在汉口又碰上大哥的一个孩子,一共五六口人,我每月工资几十块钱,几口人吃饭还凑合,拿出五六百块大洋买船票是没有力量的。这时,齐鲁的老同学劝我不要去成都,留在汉口工作算了。在汉口这个时期,我们在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准备成立医疗队。

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很早就有了,总会在上海,山东有它的分会。1935年我们从齐鲁大学毕业时,中国红十字会就吸收我们为会员。另外,医务界还有一个中华医学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所以我大学毕业后也参加了中华医学会。193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年会。当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在这次中华医学会的会议期间,大家分头议论过组织战地医疗队的问题。这个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也组织会员们讨论,日本打进中国怎么办?我参加了讨论会。会员们情绪很高,认为首先要组织起来救护伤员,要响应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参加抗战,大家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这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机构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对一些携带方便的医疗器械进行讨论和具体设计。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准备急救车、大小手术器械包、消毒器械、手术器械、手术

床、氧气袋、氧气筒、骨折用具等等。

抗战到了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总任务,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总会在贵阳。医疗队的经费,是由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的。我们医疗队手术组的几个人就在12月27号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王禹昌当队长,侯道之当副队长,我们都是队员,当大夫。孩子们当护士和卫生消毒员。齐鲁的两个校友李福怀和刘长山,也当了卫生消毒员,全队有二十几个人。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向南去,到广东、广西、湖南一带;一个是往北。他们问我们队去哪里。我们的队员都是北方人,往南去雨水多,气候受不了,生活不习惯,吃大米也不行,就决定往北去,这样离家也近一些。往北去的任务,主要是从西安到宝鸡这一段的医疗救护。1937年12月28号晚上,我们二十三医疗队的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上了火车往北走了。

1938年的1月1号我们到郑州,1月3号到西安,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刚到西安,我们马上去交涉工作。我们交涉工作,主要是去伤兵医院,因为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是救治伤员,伤员又都集中在伤兵医院。当时,伤兵医院都是军医院,归国民党的军医署管,而红十字会和各省的医院及卫生组织机构都归国民党的卫生署管。这样麻烦就来了,伤兵医院听我们说是红十字会来的,说不要我们。我们又说是白给工作,不要钱,还有医疗器械,他们也不让我们干。为什么碰这个钉子呢?首先是国民党的两个署的矛盾,军医署和卫生署搞不到一块。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在安庆重伤病医院呆了一段时间,对他们军医院的医疗作风有所揭发,他们对我们很不满。所以,他们一听说还是在安庆的那些医务人员,是齐鲁来的,他们不欢迎,拒绝进门,这是又怕我们在这里揭露他们那一套东西。

林老引导我走上革命路

我们去伤病医院交涉工作,没得到结果。这天晚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伍云甫伍处长到中国旅行社看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二十三医疗队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怎么来到了西安,打算怎么开展工作。侯道之也向伍处长详细谈了我们的任务和国民党兵站医院拒绝我们工作的情况。伍处长说:“这里不要,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延安去工作?延安有伤病员,同时还有群众,缺医少药,欢迎你们去。”最后他还说回去把我们的情况向办事处的主任林伯渠林老汇

报。他走后,我们队的队员议论了这件事。队长王禹昌坚决不同意去延安,说共产党的地方不能去,还坚持在西安等一等,请示一下看怎么办。而我们几个同学纷纷议论说,这边不让工作,那边欢迎去。我们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打日本,救伤员,哪里有伤员我们就上哪里去嘛。这样,队长和队员起了矛盾。第二天,伍处长又来了。针对我们的问题说了,国共合作是打日本帝国主义,谈不上什么党派问题。

同学们听了心里很明白,他们对我说:“老金,我们是一个人,没关系。行,我们就干。不行,我们就跑嘛!你呢,还带着几个孩子,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我说:“好!”我又问伍处长,带上家属去要不要。第三天伍处长来了告诉我们说:“不仅你们去了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欢迎,也给他们安置,而且还优待。”我们听了之后,就决定去延安。

当时,在西安的还有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三十三医疗队。这个医疗队是绥远蒙古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日本人进绥远,他们撤退,先到了榆林,通过延安到了西安,在西安待分配。我们二十三医疗队和三十三医疗队是一个中队,绥远蒙古卫生院的院长桑佩恩是三十三医疗队的队长,也是我们中队的中队长。中队长也作出了决定,两个队都去延安。1月5号,林老亲自把我们找到办事处,再一次地给我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定打日本帝国主义,军委坚决执行。你们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我们很欢迎。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给你们一些方便。延安有工作,有伤员,有病员,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林老还说:“这里很多青年到延安去学习,参加抗战。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最后他还讲了延安的生活条件差,比西安要苦一点,交通不便,天气也冷。让我们准备一些御寒的棉衣,然后送我们去延安。谈完后,我们简单作了准备,买了旧的棉大衣防寒,就准备启程了。

回想1937年到1938年这一年,我虽然参加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但都是在国民党卫生机构领导下进行的,我亲身体会到了蒋管区军医院医疗作风的混乱。这一年,是个逃亡过程,又是我生活和道路上的转折点。决定去延安之前,我对延安也曾有过一点了解。我在汉口时,听到过平型关战役的消息,重创日本帝国主义的王牌军板垣师团,打了胜仗。我佩服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想,救伤员就要

救这样的抗日的伤员。在西安的几天,也听三十三医疗队的人讲过延安的情况。他们说,虽然在延安住了一夜,但看到了延安的抗战气氛很浓,军民关系很好,买卖公平,人也和气,延安地方好,很安全。抗战爆发后,我们山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父亲也嘱咐我坚决参加抗战,参加救防工作,什么地方要就上什么地方去。父亲的抗战情绪也时刻在激励着我。当我听了林老的讲话,增强了我去延安的决心,我感到参加抗战就是前途,去延安就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应走的路。我听了伍处长的劝说,听了林老的指引,拿定主意走向了延安。

1938年1月10号,八路军的两辆卡车把我们二十三、三十三两个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径直送到了延安。当时不仅是车送,还派了两个卫兵和一个参谋送我们,保证在路上不出问题,安全通过路途上国民党的关卡。有领导的嘱咐,有八路军战士的保护,我们放心地去延安了。

初到延安

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富县,是陕甘宁边区和西安的交界处,也是一个大的关卡。过了富县就进了边区,这里的群众就完全不同了。沿路上,群众看到是八路军的汽车,就热情地招手欢迎,十分亲切。我们还看到很多青年步行到延安,他们都是自己背着行李,稍好一点的是有个小毛驴驮着行李,别的也再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了。我们这些人则是党用汽车送到延安,还有卫兵保护我们。这是党对知识分子、对技术人员的重视和关怀,因为那时,汽车极少,汽油就更困难。

1938年1月13日,两辆卡车把我们两个医疗队的全体人员送到了延安城。一到南门外,两边的群众、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夹道欢迎我们。他们打着小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热情高涨地沿道迎接我们,夹道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南门里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到了住的地方休息,欢迎的群众才离开。

晚上,在住处附近的一个教会礼堂里开了欢迎大会,由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同志主持欢迎会。参加人员有各单位的代表,有抗大各队的学员,还有各机关的卫生工作人员。特别是当时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到会欢迎我们。他们走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握手、问候,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欢迎会上,抗大的学生轮流唱歌,这队唱完那队唱,越唱越热闹。这之间,有一个人唱了一首陕北流行的歌子:“陕北好

地方,小米子熬米汤……”唱得很好!大家热烈鼓掌。旁边一个人问我们:“你们知道唱歌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人。他说不是,唱歌的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医生,叫马海德。我们一听都很震动,我当时就想马海德是一个美国医生,来到中国参加革命战争,而我是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医生,更应该在这里好好地为伤员和群众服务。欢迎会后,天虽然很晚了,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纷纷议论我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喜悦心情,大家都表示要好好干下去。

我们在延安住下后,领导上就考虑了我们的工作安排。当时,延安有两个卫生系统:一个是边区卫生系统,一个是卫生部直属系统。宝塔山边区医院归边区政府的卫生系统管。医院院长是傅连璋同志。他是个医生,是经过长征和红军一块到延安的,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健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身体不好,患有结核病。在安排我们工作时,傅连璋同志提出,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150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根据他的建议,三十三医疗队留下了一个外科大夫、一个眼科大夫。傅连璋同志又说:“听说二十三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因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病的还是很多,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我也同意留下。我们队还留了一个内科大夫谢金奎。另外还留下一个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都分别到卫生部直属系统的医院去了。我的几个孩子,有两个孩子跟他们走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个孩子跟我留在边区医院。

边区医院给了我一个窑洞,两个孩子也送进了干部子弟学校上学。这样,工作和生活安排下来,我心里很踏实。领导上的安排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不仅我有了工作,对我的家属孩子也作了安置。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了工作。边区医院是在宝塔山下,山下是门诊,顺宝塔山上去,挖了100个窑洞,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再往上的窑洞就是病房。医院里虽然都是窑洞,工作条件比较差,但工作的方法很有条理,大家相处也很亲热。我在这里工作,首先感到的是像到了家里一样的温暖,领导关怀我们,都那样的和蔼。在西安时,局势混乱,一天到晚想的是跑,现在到了延安,心安定了,想的是如何更好地救治伤员,支援抗战。我的思想起了较大的变化。我亲身体会到了,党和群众

是欢迎我们到延安的,党和群众是关心我们、重视我们的。

白求恩大夫对我的启发

1938年的春天,白求恩同志到了边区延安,他是参加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斗争胜利后来到中国的。一天,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大夫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随同来的还有一个女护士。他们到了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同志向他们介绍,说我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当时齐鲁大学和加拿大医学院有联系。齐鲁大学的医科和加拿大医学院的医学制度一样,有相同的诊断、治疗方案和操作制度。齐鲁医科毕业的学生,加拿大政府的卫生系统也给予承认,也授予和他们毕业生同样的医学硕士学位。齐鲁毕业的学生还可以到加拿大去工作和学习。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齐鲁的几个教员也都是加拿大的医生。我和白求恩同志提起老罗大夫,他们都认识,我们就热烈地谈了起来。

我和傅连璋同志一起带着白求恩大夫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回办公室休息时,白大夫说:“这个地方很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我们听后都笑了。最后他要求:“给我工作吧!”

白求恩走后,过了三天,我们从宝塔山上看见,大老远的有几个人往山上来,后边还有一个女同志,我们估计是白求恩同志和护士来了。人到跟前,我们一看全变了。白大夫做了一套延安的卡叽布工作服,穿在身上,戴一个八角帽,帽前还用红布缝了一个五角星,左臂上带了一个八路军的臂章,脚上穿的是草鞋,还是光脚穿的草鞋,这对一个一直穿皮鞋、袜子的外国人来说,很不简单。我们见面谈了几句,白求恩大夫笑着问我:“你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工人?”我也笑了,说:“你这一身很像一个中国工人。不仅像,就是一个中国工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医务工人。我还要向你学习。”我对白求恩同志这样说着,我心里很惭愧,我当时还没有他的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认识,当时我穿的还是西服、皮鞋。

白求恩同志是外科医生,他这次来由我带他查外科病房,在场的还有傅连璋。白大夫查病房,他的工作态度,正像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讲的是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他对病人,一个个地问,一个个地查,然后把查问的情况详细记在本上,再作出诊断和处理。每一过程都是他亲自操作,一点不马虎。查到最后的一个病房,这里是几个日本

战俘。白求恩大夫对这些伤员也作了细致的检查和治疗。出了病房，站在窑洞门口白求恩大夫就问我：“这里怎么还有日本伤病员？你们还给他们治疗。”我说不仅给他们治病，还让他们上学呢，专门为他们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傅连璋同志也说：“我们党有俘虏政策，优待俘虏。因为他们也是劳动人民，他们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到中国来打仗的。我们要团结他们，爱护他们，还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白求恩同志听了这些话赞扬地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领导机构，有这么好的俘虏政策，还有这么好的窑洞不怕轰炸。真是伟大！伟大！”白求恩的胜利信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这一天，白求恩大夫查完病房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们约他来做两个手术。白求恩同志对手术要求更严格。他先给一个伤员手术。手术完了，护士给伤员绑绷带，他一看很不满意。他把手套一脱，把绷带解开重新包扎了一遍，动作迅速熟练。

接下来做的一个手术是割扁桃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的女儿萧平，因扁桃腺肥大引起关节炎。我对这一病例诊断后，认为做扁桃腺手术摘除的处理，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耳鼻喉科大夫，没有这科需用的器械，也不会这项技术的操作。我和傅连璋院长商量，决定委托白求恩大夫给做手术。白求恩大夫进行手术操作时，我是助手，傅连璋同志也在场。萧平躺在手术床上，护士把消毒锅端来，拿出器械。什么器械呢？一个开口器，一把刀子，两把小镊子，还放了两块纱布，两个棉花球。白求恩大夫让护士给全身麻醉，病人懵过去了。他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腺取了出来。我和傅连璋同志在一旁很担心，没有器械，没有局部麻醉剂，做的是全身麻醉，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结果我们的担心多余了。几分钟的工夫，手术做完了，孩子醒过来站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我对白求恩大夫说：“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有了这个（指手）去为它解决问题嘛！还有没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了？”白求恩大夫说得那么轻松，但话里却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我听了白求恩大夫的话，连连说是。我还说，我平时做手术只想手术室，总想依靠现成的器械和设备。白大夫告诉我：“这个框框把你卡住了，

要打掉它，要根据条件解决问题。”后来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过了几天，白求恩大夫又来到了我们边区医院。他向我提出“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听了之后想，过去是病人找医生看病，现在白求恩大夫是不是要翻过来，让我们去找病人看病？我这么想并没有明白他所提问题的背景，也没有理解他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才知道，白求恩同志刚刚参观了延安东边的一个八路军的军医院。他看到，战场在前方，战士们在战场上受了伤，要把他们从前方运到后方进行治疗。当时，运伤员没有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全凭4个人用一块木板把伤员抬回后方。这样，走那么远的道儿，拖延了抢救伤员的时间，也耽误了伤势的治疗。所以，白求恩同志的意思，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一心为伤员着想，应该到战场上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基于这种思想，后来白求恩大夫坚决要求上前线。卫生部的领导给他做工作，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条件差、吃住都不方便等等，但是这一切理由都没有说服白求恩大夫。后来，请毛主席找他谈话也不行，他仍是坚决要求上战场。

白求恩带头上了前线，他要到现场去解决救护问题，要到发病的地点研究病的情况，解决病人的困难，他要改变原来的状况。白求恩大夫到战场救护伤员，也成了战士们勇敢冲杀的口号。战士们经常喊：“同志们冲啊！有白求恩同志在后面！”白求恩同志创造了战场救护的先例。最后，他为了抢救中国伤员，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白求恩同志不仅对战地医院的工作是这样要求，他对我们后方医院的工作也给了指导。有一次他在边区医院问我们：“你们有没有干部？送一部分干部来，我给检查一下。”傅连璋同志说：“好。”我们找了一些同志来，让他给检查看病。那时，经过长征许多干部都患了肺结核，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都留在了延安。白求恩大夫是世界六大胸外科名医之一，他给来的干部一一检查，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病史等。之后，用手提X光机给干部透视，写下全部检查结果，还将结果告诉每个干部，并说明患有什么病，注意什么问题。最后，白求恩大夫对我们医院的预防工作和干部保健工作提了意见。他提出，第一是，医生要想病人，要主动地找病人，要想办法保证人们，特别是干部的身体健康。第二是，建议干部应由组织部门和卫生部门两个系统来管。给干部分配

工作,光是组织部门分配不行,还要有卫生系统的人参加,要根据干部的身体情况分配工作。白求恩同志这些诚恳的建议,给我们指出了医务工作重点是要做好预防工作。

总之,通过和白求恩大夫的接触,我深受启发和教育的有两点。一点就是动脑想,动手做。特别是看了白求恩大夫的手术以后,我在工作中试着去创造一切,改造一切,自己动脑想的也多了,亲自动手干的也多了。第二点就是,一个医生,要处处为病人着想,要主动地自觉地为人们的健康做好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工作。在我以后的几十年医务工作中,白求恩大夫的思想时刻在激励着我,使我牢牢地记住:我是一个医生,要一切为病人着想。

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1938年的1月到1947年的3月,我在延安工作。我曾先后在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当大夫,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我们到延安后,这里各方面情况都使我们心情舒畅。这时,我和医疗队的其他成员都写信向中国红十字会汇报我们在延安的情况。我们说,延安非常欢迎医疗队,也很需要医务人员。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各地了解了情况,知道延安对医务人员不仅欢迎,而且很重视。后来,红十字会又派了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九医疗队进入延安,还指明让她们到边区医院工作。这个队的大夫、护士都是女的,队长是姜兆菊。她们一来,我和谢金奎就回到了我们二十三医疗队。我们的队员大部分都在延安城东60里的甘谷驿,这里是第二兵站医院。我在这个兵站医院是救治伤员。这里的伤员和安庆医院里的伤员相比,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个兵站医院里,伤员和医务人员亲如一家,医务人员对伤员是认真负责的。医院的伙食搞得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伤员们一边治病、养伤,还一边进行学习,病治好后又重返前线。我们给伤员治病过程中,也受到很大教育。有的病,在治疗时需要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人的头脑从有控制、有意识,逐渐到不能控制、无意识的状态。在这个过程期间,从医学角度说,人的思想里哪一种意识最强,哪一种意识在这期间就表现出来。我们的伤员在麻醉逐渐失去控制和麻醉后将苏醒时,他们喊的是:“同志们冲啊!杀啊!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伤员们的这些表现,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这时我的思想

又前进了一步,我认识到,党领导下的边区好,边区的干部好,群众好,部队的战士也好,我们的抗战一定能胜利,我也决心为抗战出力,要跟党走。

1938年宝塔山边区医院搬到了黄瓜塔。延安的群众治病、干部住院治疗都很不方便,希望能在延安再建一个医院。1938年的夏天,延安成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傅连璋同志当处长,筹备中央医院。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1938年春天延安遭轰炸,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则借祭祀黄帝陵之机跑到汉口,投降了国民党,于是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央指定林老代理。林老后来到延安,问起我,大家说我在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林老说:“他是妇产科大夫,为什么给他放到那里去呢?把他要回来,让他到黄瓜塔边区医院去工作。”1939年7月,领导上和红十字会交涉,又把我调到了黄瓜塔边区医院。在这里干了两个月,1939年的9月中央医院成立,我调到了中央医院工作。

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傅连璋同志兼任院长,副院长是石昌杰,医务主任魏一斋,他也是我们齐鲁的同学,原名叫魏兴谦。中央医院的筹建和物质准备上,这些同志都起了主导作用和积极带头作用。

中央医院刚成立时,医务人员很少。魏一斋到中央医院之前,在延安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他从医院带了两个大夫,一个外科大夫刘允中,一个内科大夫邵大达。把我从黄瓜塔边区医院调来,做了医务副主任,兼妇产科工作。还调了一个小儿科大夫侯健存,一个内科大夫毕学礼,他是一个印尼华侨。大夫就这几个人。当时,中央医院由组织部领导,组织部长是陈云同志,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负责全国的组织工作,很忙,所以中央医院的党政工作都由李富春同志负责。“中央医院”的4个大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由外科刘大夫刻在了木板上。医院建起来了,没人怎么办?中央领导同志对医院的工作很关心,号召各单位的医务人员,支援中央医院。陈云同志动员中央党校的学员到中央医院学医。党校的学生是全国来的干部,至少也是县委职务,他们不少人都报名参加了医士班。我们办医士班,学临床学,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学习,学员们自己也看些书。其他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就一科一科地学。我们也开解剖课,把婴儿的死胎解剖后,进行讲解。遇上杀猪宰羊时,还讲解一些内部器官的形状和构造。这个医士班训练了不少医务人员。除开训练班外,对一些学校也进行了动员,因为当时学生们都愿意到前线,愿意到后方去组织群众抗日,而不

愿意干医务工作。黎平同志是陕北工学院的,同学发现她有一个体温表,后来一问才知道她是上海助产学校毕业的,原来还是个医务人员。组织部知道后,就把她调到了中央医院妇产科做助产士。同时,魏一斋的妹妹魏洁,也到妇产科做了助产士。这样仅有的这些大夫和护士就开始了工作。

中央医院在北门外的李家湾,离城十几里路。中央医院的任务主要是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服务,也兼管边区政府系统的医疗工作。医院的个别大夫还担任教学任务,为边区政府的卫生学校、八路军的中国医大、中国女子大学教课。我担任了女子大学的教学任务。

中央医院是在一个山上,远处看去,一排排的窑洞像是一层层的楼房。窑洞从下到上共有四排,第四排是妇产科,有100个床位,大一点的窑洞是产房,外科手术室、婴儿室也都在这排窑洞里。病房的设置简单,一个窑洞有五六张床。那时的床就是一块木板,两头架起来,因为棉花和布都很缺,就在木板周围钉上木条,中间填上稻草和麦秸,外面用床单一罩,这就是病床了。床上再放一床被、一个枕头,有的床前还有一个木茶几,这就是病房的全部东西。窑洞本身是冬暖夏凉。但是,冬天,一般的病房都烧上一盆木炭,使窑洞暖和一些。手术室、产房和婴儿室是在地下挖一个洞,上边盖上石板,用三合土一砸,墙角处还挖一个小洞做烟筒。取暖时是在窑洞外烧煤,热气从沟里通到各窑洞,这样手术室、产房和婴儿室的恒温在22℃上下。窑洞光线很暗,手术室要亮一些才行,用的是汽灯,一般的病房只能点麻油灯,办公室点一个带罩的煤油灯。护士们去发药就拿个手电筒,或点上一支蜡烛。那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取暖和照明条件都很差,和现在是无法相比的,但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紧张愉快地医治了很多病人。

战争年代里,延安的物质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党组织为了保护妇女和婴儿的身体健康,想尽了一切办法,尽量给产妇吃白面,因为蔬菜和水果都比较困难。但是,好一点的是边区出小米,猪肉、鸡和鸡蛋也很多。有的战士从前方回来,带的罐头也可以分到一些。这样,产妇的营养品就有了,她们住院的一个月养得很胖,婴儿长得很健康。那时,一般孕妇都要提前两个星期住院,因为机关离医院比较远,交通也困难,为防止临产前出现意外情况提前住院能保证安全。生完孩子以后,产妇还要住两个星期才出院。妇女在住院期间,我们也对她们进行一系

列的宣传教育。助产士要给她们上课,讲些妇女卫生常识,怀孕和生产的经过,如何接生,以及婴儿的保护和处理,等等。有时还带她们到产房去看接生。经过讲解和观看,她们心里有底了,消除了思想上的紧张。所以,一般孕妇在产前或产后都没发生过什么疾病,基本是正常生产。当然也有胎位不正、骨盆狭窄等难产手术,也有宫外孕、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妇科手术。手术前,我们都对病人做好工作,她们也能很好地和大夫配合,使手术顺利进行。所以,那时凡是在中央医院生孩子的同志,出院时一般都能达到一个助产士的水平。出院以后,这些同志无论到前方,还是到后方,她们学到的知识都很有用处。特别是陕北学院、抗大和女大的学生,她们到敌后,可以在群众中开展卫生普及工作,群众都称她们是医生、大夫。

为了促进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中央决定要表扬一些同志,中央医院推选我为妇幼卫生工作先进生产者。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召开了大会,进行表扬,还发给我一张写着“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当时,我经常到女大上课,女大的学生还特意用布刺绣上“民族之光”4个大字,送给我留作纪念。我在中央医院仅仅做了一点工作,大家这样信任我,使我很受鼓舞,更坚定了我为边区人民服务的信念。

1941年前后,中央医院的情况好转了一些。由周总理建议,何穆同志带一批医务人员从重庆二次进延安。这批医务人员中有大夫,有护士,还有化验员。何穆同志做中央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他是肺科专家,留学法国。他来时,对结核病的防治工作采取了一些办法。另外还来了李治忠大夫。我们还办了医士班,医科大学的学生也常到我们医院进行教学实习。所以,这时中央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人数增多了,护理工作也加强了。但条件仍是比较差。周总理为了号召大后方的医务人员向中央医院学习,让中央卫生处给我们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照了相,带到后方进行宣传。这一宣传,使重庆的很多新闻记者要到延安参观。这些记者到延安后,看了各方面的情况,参观了中央医院的各科设备。最后他们说:“你们中央医院和重庆的中央医院相比,人员和设备条件相差得很远。可是,你们的工作效果要好得多。这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个人名誉,而是为了革命。医院的伤病员也都是革命人员。”这些记者的参观,不仅影响了后方的医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同时对延安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听说了中央医院的情况,她

们就主动地到中央医院检查身体,还住院生孩子,中央医院的影响很快就扩大了。

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一直是我负责,当时我们有生产记录本。延安疏散时我带在了身边,一直保存到现在。黎平同志根据保存下来的几个记录本作了一个统计,数字是这样的:

1939年9月,延安中央医院开院。接生人数:1939年50个(9月17日开始);1940年276个;1941年289个;1942年412个;1943年481个;1944年500个;1945年774个;1946年334个;1947年302个;1948年310个;1949年4月止86个。

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延安中央医院接生婴儿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总数是3814个(还有两个本子没保存下来),生产数量最高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同志都到了东北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以分娩的同志少了。解放战争时期,生产数量也减少了,这是因战争关系,很多同志做了流产。以上生产数字中,难产的有400多个,多半是第一胎。从当时的困难条件来看,这个成绩还是很好的。分娩的时间,当时在蒋管区,一般初胎分娩要48小时以上,而在我们边区,一般在16—18小时。产程的缩短与妇女所在地区有关系,边区的妇女都是革命青年,她们经常参加劳动,这是一方面。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听取了白求恩同志的建议,做到了预防为主,对孕妇进行了产前教育,使她们心中有数,保证了顺利生产,保证了婴儿的成活率。

中央领导鼓励我前进

在中央医院工作,接触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多了,接触的党员也多了,而且还有机会听听报告和参加政治学习,所以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不懂到慢慢地知道了一点。首先,在接受病人住院时,对我就有促进。病人来住院都要带上住院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我在医院是医务副主任,又是妇产科主任。他们来了就把介绍信和组织关系交给我,我说:“组织关系交到那边,我这里不收。”同志们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议论说:“你看,这个主任还不是一个党员。”我听后,知道这是在给我提意见,我决心努力学习,好好工作。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对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

还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也很大。一天,统战部打电话说,齐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到延安参观,想见见老齐鲁的学生,让我和魏一斋去。我们去了,一看是齐鲁大学哲学教授劳津,他是社会党人,信耶稣教。谈

话中我们知道,他到延安是要看看共产主义,看看人的关系和社会组织。我深有体会地说:“延安已经实现了《圣经》上讲的天堂。我们在这里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大家是真正的兄弟,互相团结友爱。”劳津点头赞成,他说:“我看到的也是这样。我们天天祈祷的东西已在延安成了现实。共产党干的,比说的好得多。”这次和劳津谈话以后,我更感到了延安不错,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实现了互爱互助。在政治学习中,我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了。那时,马列学院的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哲学,讲马列主义。我们也经常听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传达报告,这样理论知道的多了,眼界也开阔了。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同志从苏联回来,他们也常讲一些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这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世界,认识了革命,头脑里信仰共产主义的念头慢慢产生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边区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各个医疗队都要撤走,要到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二十三医疗队在延安的时间,队员们工作勤勤恳恳,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听说我们要走了,病员都不让走。我们也对撤走医疗队提出了抗议。我们认为,延安还有伤员,还有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医疗队不仅不能走,还应该再派人来。最后我们得到的答复仍是全部医疗队要撤走。我怎么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起了不小的变化。我想到,在延安工作很好,领导关怀我,群众教育我,特别是共产党领导抗日很坚决,中国抗战一定能胜利。同时,我也亲眼看到了国际友人马海德、白求恩,他们都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革命,他们的精神不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嘛!我考虑之后,决定不走了,坚决留在延安跟共产党走。

二十三医疗队的其他成员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护士、两个工友留在了延安。从此以后,我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就没有关系了。组织上知道我留在延安,对我很支持,并且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方便。那时都是供给制,为了保证我的生活和工作,组织上给了我一个炊事员,一个马夫。炊事员李子敬是个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王首道同志亲自送我一匹红马。贺龙同志从前方回来,说我给人看病经常出去,送了我两匹马。先是送一匹白马,让驮东西用;后来又给一匹黑马,说这是一匹日本战马,出去看病骑上跑得快。另外,医院还给了我一匹马。我一个人就有4匹马。当时的一匹马比现在的一辆小汽车还贵重。延安的住处很困

难,但还给了我四个窑洞,一个做饭,两个睡觉,还有一个后来给了苏联专家阿洛夫,他是延安中央医院请来的苏联内科医生。我们吃饭是实报实销,待遇在当时情况下是比较高的。总之,我这样一个医生留在了延安,组织上给了很多的照顾,其他很多老同志比我艰苦。医院的大夫、护士和病员看到我留延安不走了也很高兴,还鼓励我,希望我积极争取加入党的组织。在这之后,领导和同志们时刻在关心着我的进步,毛主席也曾和我谈过入党问题。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为了更进一步地启发我的觉悟,鼓励我在边区干革命,为边区医疗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3位领导人,在1941年先后为我题词留作纪念。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 毛泽东敬赠金大夫”;朱总司令的题词是,“茂岳同志留念 不但医人 还要医国 朱德”;周总理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 茂岳主任 周恩来”。领导的题词给我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题词时还给我讲了所题词的含义和深刻的道理。毛主席说,医生工作是救人事业,我们共产主义更是救人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革命事业,是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使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真正得到自由,得到幸福。朱总司令在题词时,讲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过,医生医人很好,还要医国。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还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要救国,要治国。所以,医人、医国是一致的,但主要的任务是先医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国家解放了,独立了,事情就好办了。因此,医人,还要医国。领导的这些话,把我从事的医务工作同伟大的革命事业,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密切地联在了一起,我感到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鼓舞着我勇往直前。这时,我的心胸开朗了,我工作的劲头有了,前

进的方向也更明确了。从这以后,我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回答领导对我的希望,我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1942年3月28号这一天,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以为他病了,很快骑上马就去了。陈云同志笑着说:“不是叫你来看病,而是要和你谈一个事情。”陈云同志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他说明是找我谈我的组织问题,让我详细说了家庭情况,我从在家上学一直谈到进延安工作。陈云同志给我讲了共产党员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世界;第二是,共产党员要为人类牺牲,要服从组织。我表示,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不怕牺牲。后来谈到我是回族,陈云同志说,这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最后我还表示,自己各方面还很差,工作、思想还跟不上,需要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陈云同志勉励我说,加入共产党,组织上成了党员,但思想上还要接受组织的帮助和教育,进一步改造思想,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我们谈完话,陈云同志打电话请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我们的院长石昌杰同志,一位是医院秘书长苏爱吾同志。他们带我一起到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张凯的房间里,那里挂着鲜红的党旗。我就在这里,举起我的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宣誓后,陈云同志对我们三人说:“茂岳同志已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你们三人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同志是组长。你们三人一起过组织生活时,让医院支部知道就行了,不必向群众说,也不要向其他党员讲。有什么重要事情由石昌杰同志传达给你们。”这一天,1942年3月28号,延安还下着小雪,我的心里确是暖烘烘的。我,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仅仅是开始,开始了新的里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注释:

①回族人在清真寺里念经,毕业了,叫做挂幛。

②明清时清真寺大殿里供奉有“祝延圣寿”的万岁牌。

责任编辑:马金宝